

改革开放制度变革特征与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赵晓雷

摘要：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历程在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间经历了几次发展转型。这种发展转型既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社会实践对经济思想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学术形态的发展演进在相当程度上受制度、政策的引致。本文根据制度变迁演进轨迹，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改革开放准备阶段（1978—1983年），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84—1991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92—2011年），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2012年以来）；并根据这一线索对各时期经济思想发展转型作出概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 经济思想 发展转型

引 言

改革开放社会实践与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内在联系及阶段特征既演绎了经济思想发展流程，也标识了经济思想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术形态的转型特征。经济学是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经济思想发展转型与改革开放社会场景及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内在联系和阶段特征，是中国经济思想学术体系的重要内容。

经济理论界对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论题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关于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转型，学界总结了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

[作者简介] 赵晓雷，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zxl@mail.shufe.edu.cn。

* 感谢外审专家的匿名审稿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弊端（杨永华，1989；张朝尊和文力，1992），阐明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调节的必要性（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3）。同时，有学者认为探索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理论基础和概念体系应成为经济思想研究的主体框架（郭元晔，1992）。

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转型，学界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特征、规律的变革引致经济思想研究内容的转型和扩展，商品经济、社会分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所有制与社会利益关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等成为经济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李斌，1991；晓喻，1995；陈武元 and 杨俊辉，1990）。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经济理论研究主要转变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于祖尧，1991）。有学者将经典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来解释“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经济体制形式和经济思想转型（李义平和张文多，1991）。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研究开始由规范研究逐渐向对现实经济有更强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的实证研究转型（林珏，1996）。

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转型，一些学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融合特征，主要体现在概念范畴、理论要素、分析方法等层面（郑秉文，2001；胡钧，2008；王昉，2013）。然而，在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取向上，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假设、范畴、理论进行评判，指出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叶航，2003）；也有一些学者主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经济学（李绍荣，2000；王国成，2012）。中国现代经济思想表现出鲜明的中西结合，力求符合主流经济学技术规范的发展特征（吴易风，2008；郭俊华，2010；程霖、张申和陈旭东，2018）。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转型，一些文献关注了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呈现出规范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型趋向；也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也是需要规范研究方法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宽泛的研究领域，因所涉及的层次和视角较多，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应该更合适（郭克莎，2016；赵峰和段雨晨，2019；何诚颖和余鸿宁，2021；张雄，2021）。一些文献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陈登科，2020）、企业的市场主体功能（李政，2012；何瑛和杨琳，2021）、政府职能转换（苏剑和陈阳，201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郭学

能和卢盛荣, 2018; 刘真, 2021) 等角度, 讨论了经济思想转型的时代特征。

在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基础上, 本文系统考察 1978 年以来的 40 余年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流程, 研究分析经济思想的发展转型, 对每一阶段的发展转型特征(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学术形态、分析技术等)作出概述分析, 并对经济思想在专业范式及“科学共同体”层面的转型给出理论辨析, 以期描述出经济思想系统性、整体性发展转型架构。

一、改革开放准备阶段(1978—1983 年) 经济思想发展转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开启了改革开放历程。思想理论界突破了唯生产关系论, 确立了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决定经济体制、经济关系、经济利益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理论及基本国情, 经济思想研究将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活动置于价值规律之上, 经济思想主流理论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理论基础向价值规律理论基础转型。

(一)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

1978 年 12 月 13 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他指出: “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 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 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 1988: 11)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1978 年 12 月 18 日, 我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阐明了中共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 以及改革的方向、内容及基本措施。邓小平《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在若干方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范畴, 如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 强调微观经济层面应有更多经营自主权, 强调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问题, 强调经济管理体制权力下放等。因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具体的改革方案, 但其对经济体制

改革的推动意义在于明确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探索 and 大胆实践开辟了道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浪潮正是以此为起点，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制度变革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最初是由理论界提出的。1979年，《经济研究》第5期发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一文，提出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早提法。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是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完整的阐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阐明了中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必须与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必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构建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主要体现在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改革，以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

（二）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理论范畴突破分析

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引致经济思想学术观点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分配、经济运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理论范畴有了突破。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主要实现形式——全民所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一传统理论观点展开讨论，提出了改革大一统的公有制、构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进一步深化的讨论是提出了所有制形式的现代化和所有权的权能分离，旨在公有制的大范畴下寻找产权主体独立及产权排他性制度安排，以使所有权和产权制度符合商品交换、市场交易的需要。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政策层面正式确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982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在社会分配方面，对按劳分配及劳动价值论等理论范畴从新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制度变革角度展开讨论。理论上的突破是沿着从劳动力商品到劳动价值论及价值决定多元论的路径展开的。其理论价值在于，试图解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如何量化、如何操作，商品价值的决定如何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商品价值量分配及交换相契合等问题。按劳分配及劳动价值论是一个规范经济学论题，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和理论界长期研究的范畴，这些范畴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所以，制度变革的演进必然会引发新的观点，产生一些突破。

在经济运行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观点实现了突破。社会主义经济既然不是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还有商品经济成分，在经济运行层面也就不能单一地依靠指令性计划来调节，还需引入市场调节。1979年3月8日，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中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他指出：以前计划工作制度中的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为此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即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调节的部分。他强调，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必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他认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部分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陈云，1982：69、71）。邓小平赞同和支持陈云的上述思想，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阐发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经济道路时，指出应该让“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邓小平，1994：247）。

根据陈云的思想，经济就是双轨运行，主体部分受计划调节，从属部分由市场调节。这种经济运行和调控模式在管理层面是有操作性的，但在现实

经济发展层面则较难将经济约束在板块式的框架中。一旦引入市场因素，板块式的框架约束必然会被突破，经济的双轨调控运行不能长久。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对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的经济运行模式作出了概括：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党的十二大报告第一次划分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将国民经济运行分为3大块，其原则是大的方面用计划管住，小的方面放开。这一经济运行模式的设计体现了陈云的双轨运行及板块式调节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学界在计划经济单一调节的观念被突破的基础上，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以及计划与市场在经济运行层面如何有效结合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方面，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理论范畴在新的认识层面上展开了讨论，并对1950—1970年间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作了突破。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般是指斯大林于1952年出版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表述，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1961：31）。理论界一些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从产品经济和使用价值角度概括社会主义经济，但社会主义经济中仍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也发挥作用；并进而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涵等问题展开讨论。^①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制度变革实践背景下，理论界对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理论范畴也展开讨论，将其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市场调节相联系，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表述。

（三）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一个显著标识是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支点，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突

^① 相关论述请参阅《经济研究》编辑部（1991）。

破的理论形态首先表现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及计划经济体制中注入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进而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理论范畴的传统观点进行新的思考和研究，引致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入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调节相联系的框架，并开启了将经济运行置于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主流理论构建。

其实，如果从理论创新角度考察，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就提出将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相联系的观点，并展开创新性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卓炯在1961年提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生产的观点，他认为商品生产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自然进程，只要有社会分工，就存在商品生产。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的关系，商品经济也可以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服务。^①这一观点在1961年应当说是富有创见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1953年，薛暮桥发表了《价值法则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一文，认为国家计划不能无限制地支配整个国民经济，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起调节作用。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否认价值规律作用（薛暮桥，1953）。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关系的讨论中，做出最重要理论贡献的是经济理论家顾准。他在195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同意当时流行的“计划经济是主流，价值规律调节只是补充并将逐步受到限制”的观点，鲜明地提出要充分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社会主义经济，同时要限制经济计划对经济特别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顾准，1957）。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理论高峰是孙冶方于1959年发表的《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该文提出价值这个概念不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何一篇中都是不可少的，少了它就不成其为政治经济学，也不成其为经济。因此，该文指出要大大提高价值这个范畴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孙冶方，1959）。王亚南主张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他认为价值规律具有一切社会形态的商品生产的共有特性，它的基本作用是促进生产。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真正作用，是在它提高劳动生产力、促进生

^① 相关论述请参阅卓炯（1981）。

产的积极作用方面表现出来的（王亚南，1959）。

以上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相联系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创见，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思想转型的重要先期思想资源。但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些思想和理论并不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主体框架或主流观点。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商品经济、市场调节、价值规律等范畴开始成为主流理论要素。价值规律不仅是市场调节的基础，也是计划经济的基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都必须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经济思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发展转型。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84—1991年） 经济思想发展转型

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准备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实践进入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阶段。当时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把实现生产的商品化与实现工业化、实现生产的社会化相联系，既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又突出了建立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与这一社会实践相联系，经济思想的研究内容及相应的概念范畴体系发生转型。

（一）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

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七五”期间将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准备阶段进入到实施阶段。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基础是在前期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基础上，明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

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是：逐渐明确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是“全覆盖”式的发展阶段，而不是“板块式”地存在于计划经济之外的经济空间；逐渐明确了计划与市场是内在统一的，作用范围是覆盖整个国民经济的；逐渐确认了经济运行机制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都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系统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6月，邓小平重申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时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邓小平，1993a：306）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规律的客观要求。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推进到“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这一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和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整个国民经济的。这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适应于生产力发展要求，推动了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经济运行层面的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二）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理论与现实经济运行相结合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经济学界所关注的问题也从理论概念逐渐转向现实经济运行，运用当时所掌握的知识和分析工具，力图对经济运行作出设计或解释。

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制度变革相联系，经济学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视角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微观经济运行及国有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相联系的通货膨胀、与宏观调控相联系的经济周期及宏观经济管理、比较经济体制等展开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观

点。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范畴，但理论界从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构建商品经济运行微观基础的视角展开研究，进而对所有制改革进行探讨。所有制研究与现实经济相结合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特征是不再囿于公有制既定的理论前提，而是将所有制与适合生产力水平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相结合，这种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标准出发讨论所有制形式的理论视角创新是所有制理论研究的一种改进。循着这样一种观念，经济学界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概念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概念，为从生产力标准出发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开拓了思路。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也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之争转为计划和市场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如何有效结合。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也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基础之上。并从操作的角度讨论计划与市场调节的层次性（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功能。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也切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其重点转到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微观市场主体；并循着“两权分离”的理论思路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提出了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制、通过横向联合组建企业集团等具体方案。由改革实践所推动，国有企业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一些理论建议还运用于改革实践。

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是价格改革。计划经济是与价格管制相联系的。在计划经济中，价格所包含的信息并不反映实际市场供求关系，因此价格不成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更多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由市场调控，扭曲的价格体系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在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阶段中，价格改革主要是结构性地调整物价，使商品的比价逐渐趋于合理。政策设计是尽可能控制货币发行量，避免价格改革所引致的通货膨胀。但由于计划经济的供给短缺特征，计划收购价格要比“超购加价”、集市贸易价格、企业超产自销价格低很多，一旦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国家规定的价格逐步向市场价格并轨，必然出现价格的上涨。在此之前，由于对价格的计划管制，中国一般不存在通货膨胀这一经济现象（或者说是以凭票供应这一形式存在“隐蔽性的通货膨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价格改革的推进，价格、货币供给与社会总供求的市场联系日益密

切，在成本推进和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中发生了通货膨胀，经济学界也开始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和治理展开研究。由于通货膨胀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因此对它的研究必须要有新的知识准备和分析工具，这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学习。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调节作用的不断增强，经济增长出现了波动。为解释经济波动，经济学界开始研究经济周期理论，虽然较多的研究仍不脱规范研究的积习，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运用经济统计等工具致力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与经济周期研究相联系，经济学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角度研究宏观经济失衡，提出了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直接调控、间接调控等观点。总量失衡、宏观调控的研究必然要与宏观经济学的原理、概念、方法相联系，并逐渐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相衔接，也使经济学研究具有“致用”的特点。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发了经济学界对国际范围内的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研究。事实上，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课题，主要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类经济体制进行比较。这种研究并不像此前的从意识形态或空泛概念出发进行比较，而是运用信息结构、决策机制、动力结构、利益均衡、秩序理论、经济绩效、交易成本等理论和分析工具，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探讨中国经济体制和工业化发展的有效模式。

（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可以表述为：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而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经济问题，推动经济学开始由规范向实证的范式转型。

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比较习惯在一些定义和概念上展开“思辨性”讨论。一般的套路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作为理论依据，用“规范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怎样提出观点和构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理论上以及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推动下，经济学界的研究逐渐从理论教条出发转为从中国的国情特点、生产力水平、改革开放实践出发，力求使理论研究更切合实际和更具有解释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在运行层面或制度操作层面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理论界仍有观点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只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特征。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具备了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一规律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形式亦即计划经济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更多的理论研究则是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经济形式出发，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层面的相容性和互补性，并提出一些具体的运行设计（《经济研究》编辑部，1986，1991）。如果从国际考察，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效结合也是一种发展趋势。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形成了稳定的宏观干预体系，加强宏观调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而进行的重要变革。另外，东欧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也较早地进行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实验。如匈牙利就曾长期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模式，南斯拉夫实行自治计划管理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模式，等等。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是由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业化发展阶段等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生产社会化发展趋势的。

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学界的主流已从此前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规律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的讨论，转入运用经典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解释“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经济形式，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和新的理论范畴。经济思想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方面开始由规范研究逐渐转向与现实经济更多建立联系、试图向更具解释力的实证研究范式转型。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1992—2011年) 经济思想发展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昭示着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从理论角度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历史性的制度创新，不仅仅是经济运行层面的转轨，更是涉及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深层次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经济思想理论创新相结合，引致经济思想在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专业范式等层面的发展转型。

（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1992年7月11日，《经济日报》发表长篇文章《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明确提出发展市场经济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必由之路。1992年7月15日，《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革特征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特征的关键词一是将经济体制改革与资源配置优化相联系，二是将资源配置优化与市场相联系。这是前一阶段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调节、价值规律改革路径的合乎理论逻辑的深化，也使经济体制的架构与现代经济学更加契合。为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在所有制结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分配制度、政府职能等方面实施相应的改革，判断各项改革措施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5年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纲领的确定，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层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层面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强调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性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到开始完善，改革主线是清晰的，即从“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革的推进和深化既是适应新形势和新发展阶段，也是市场化改革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强大动力，为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依靠市场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和发展活力。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一改革主线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深化。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首先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四大在确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首次做出界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定义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中，而不再是“补充”。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文件中看到对所有制结构的阐述做出的重大修改。党的十五大

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阐述，在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予以宪法意义上的规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提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阐明，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积极引导，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其发展。这一制度政策变革线索反映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在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绩效，这一制度因素作为重要的内生变量，支持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并以持续对外开放为契机，使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主流。中国的改革实践证明，改善制度供给条件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理论创新研究概论

所谓创新研究，特指结合改革开放的经济社会实践，突破原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框架，对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探讨和解读。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经济学界在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讨论中，有许多论者认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是经济运行在总体上以市场为中心而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经济制度。他们指出：市场经济不是中性的制度范畴，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则不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属于中性概念，可以互相结合，共存于同一社会条件下发挥各自的功能（熊俊，1991）。这种将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机制区分开，接受市场调节而不接受市场经济的观点在当时较具普遍性。但还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经济学界就有观点提出：计划与市场是现代化商品经济共有的起互补作用的运行机制；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或计划市场一体化，有助于经济协调稳定增长；中国改革

的成功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熊俊，1991）。1992年以后，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形成一个热潮，并逐渐从观念层面深化到制度建设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合理性，研究者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价值规律等范畴，而是直接从资源配置范畴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也是社会经济运行及经济活动效率的核心环节。计划经济是靠行政性计划和政策来配置资源和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实践证明其是低效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就是改革计划体制，引入市场调节因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所以只有从资源配置范畴出发讨论，才能讲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在经济理论方面，还是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方面，都是一种创举。这一制度创新的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更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邓小平，1993b：149）。根据党的十四大的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其性质和特点体现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3个方面，其中最具有根本性的是所有制结构，即以公有制为主体。要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关键问题。经济学界就所有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涉及对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新解读、所有制是手段还是目的、国家所有制改革思路、所有制结构及组合、公有制为主体的理解和计量等方面。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创新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现代产权制度等概念范畴及相应研究成果上。

所有制结构思想的提出应该始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述相适应的关于所有制的新认识，第一次正式确认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经过1982年党的十二大、1984年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发展，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描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已是一种经济社会现实，也是经济学界的共识。思想理论界对所有制的内涵、所有制结构及形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界定、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路径、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等展开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这些研究课题都突破了原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框架，都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生成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研究和讨论，其理论意义在于将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即在不改变公有制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实施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传统理论观点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定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再加上集体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全民所有制是通过百分之百的国有国营这一形式实现的。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必须对公有制实现形式进行新的探索，在所有制层面形成独立的市场主体。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是一个热点研究领域，提出了诸如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等思路，利用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探索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

随着所有制结构改革及公有制实现形式改革的推进，产权的流动和重组成为常态，资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元越来越多，形成了新的所有制结构形态——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包括外资）等参股、投资的主体多元化的所有制经济形式，主要采取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资本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的方式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适应经济市场化发展、增强公有制经济活力、提高微观经济活动效率的改革思路，也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有创见的学术研究课题。

大抵在20世纪末，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诸如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法学与经济学等较多地被引入中国，这些理论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研究和操作设计需要，特别反映在关于“现代产权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改革思路方面。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建立归

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内涵是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包括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现代产权制度研究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方面。特别地，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的思想在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得到确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除了体现在所有制结构上，另外还体现在分配制度和宏观调控方面。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与之相联系的观点包括建立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工资增长体制，保护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兼顾公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了宏观调控体系的深化改革，经济学界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框架，从总量调控定义宏观调控，主张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宏观调控要采用经济手段和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在宏观调控研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转变政府职能。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要从计划经济为主时期的资源控制者和配置者转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并更好地发挥国家规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在制度层面保障经济社会有序运行和更好发展。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可以表述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应用进一步融合，在概念体系、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等层面互相交织，相当程度上整合在一个研究框架中。中国现代经济思想表现出鲜明的中西结合、力求符合主流经济技术规范的发展转型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两个新的要求。第一，对现实经济（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有更强的解释力；第二，范畴体系和学科框架要有开放性。同时，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借鉴也更系统、更求实效。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不再是零散的，而是整个理论体系、整个学派的引进介绍，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及新学科也有及时的介绍和了解，对基本理论把握得更准确，对基本分析方法也有更广泛的运用。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基本假设、理论框架方面的范式特点，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力、预测力等对中国经济思想有比较深刻的影响。所以，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这一时空节点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就有进一步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种融合不仅仅是若干范畴、概念的交叉和吸纳（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加入机会成本、均衡价格、效用函数、消费函数、总供求、充分就业等概念范畴），还是在范畴体系、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方面的吸纳和融合。许多经济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研究中国经济，在大部分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中，都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运用的状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缺失现成的知识准备和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但经济市场化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现象、问题、矛盾，需要更专业的经济知识和理论作出解释，需要进行实证性的研究。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经济思想以中西融合为特征的转型，既适应了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在体系、框架、方法层面的新的发展。这里所谓的“中”，是指原来的或“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些概念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相应的经济思想理论。即使是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概念范畴体系上与西方经济学也是有所交叉融合的，因为两者的理论来源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内容、理论框架方面还是有本质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同一理论体系中不同流派的差异，而是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异。所以，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表现为一种趋势和主流形态，但两者并未融合为同一理论体系。事实上，针对这种融合趋势，经济学界也展开了讨论。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应该从

对原有体系的修正和补充转向批判与重建，主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甚至干脆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提法而代之以“现代经济学”。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指出，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不能走“西方经济学化”的道路，还是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经济学在不同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中一定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会体现在经济哲学层面、研究方法层面、理论体系层面。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基本因素应该是有通识性的，比如资源稀缺和选择。基本因素通识性构成了交流的基础，也为追求科学普识性提供了路径。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历程演进，中国经济思想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应用进一步融合，这种发展既是适应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学术形式发展转型的阶段特征。

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2012年以来）经济思想发展转型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核心问题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政府作用的科学性、经济性、有效性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市场体系的健全、市场交易的规范、市场经济制度的发育水平又是提高政府作用效应的基础。所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研究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等方面的一般规律，又要联系中国实际，从理论上、制度上、操作上研究新兴市场经济体条件下政府作用的目标、手段和相应的管理体制，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制度变革特征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完整界定，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表述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并明确将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反映了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及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互动的客观要求。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该决定首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阐明，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该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与之相配套的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这里的两个关键词——产权有效激励和要素自由流动，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操作性节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中心。经济活动的动因是追求经济利益，而平衡经济活动成本和收益的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及其激励效应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成本补偿和利益分配，进而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另外，市场配置资源一般是指生产要素，即用于生产产品和劳务的资源。生产要素是生产产出所必需的投入品，作为稀缺资源，

生产要素有效配置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有效的产权激励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前提下，资源配置效率趋向于提高。所以，产权有效激励和要素自由流动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路径。

中国从1992年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到2012年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框架性任务。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完善到加快完善的改革步骤始终围绕着市场与资源配置这条主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的是资源配置优化、经济效率提升、社会福利增长，这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所必需的。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和起决定性作用为主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革特征还体现为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将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更紧密联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理论本体化研究特征分析

所谓本体化研究，是指经济思想经过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体系的反思与突破，经济思想理论研究范式和方法从“规范”为主向“规范”与“实证”并重，经济思想理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需要而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借鉴及融合；发展到经济思想理论研究进一步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及实践，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现实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现实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划，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现实运行相结合；以中国的发展需求为主体，以“中国化”的理论构建和观点设计为体裁，展开经济思想本体建构性

质的学术研究。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一些增长和发展中的弊端也集中体现，如经济发展的粗放、经济运行效率较低、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及社会成本上升、居民的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脱节、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或基本国情，经济学界的“本体化”研究大体集中在四个板块。

第一，以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发展理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线索，构成经济思想理论本体化研究的第一个板块。这一理论研究板块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转型发展要求出发，研究讨论的论题包括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社会成本的协调，经济效率、收入分配、均衡补偿之间的平衡，工业化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理论及实证，“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中国经验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 and 宏观经济运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经济新常态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等。与这一板块的研究内容相联系，还出现了“新结构经济学”等以中国改革和发展实际为基点的研究，试图从“资本”“劳动”的资源禀赋变化角度探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以上经济思想理论研究的论题和视角基本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及改革开放的现实状态和现实需要。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经济进入转型期，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期。以这样一个时空坐标为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发展理念的线索作了概括。从需求看，已经不单单是物质文化需求，还包含物质文化、公平正义、共享互惠、社会进步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愿望；根据需求的变化，供给也已经不单单是社会生产发展、经济高速增长，还要求平衡的发展和充分的发展。平衡发展就是要兼顾总量与人均、区域与城乡、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发展平衡，充分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以及高质量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有关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去杠杆及实体经济发展、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方式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全面深化改

革的路径等方面的讨论和研究，都紧密联系中国的经济实践，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阶段、新矛盾、新问题，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场景和经验数据，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提出政策依据和理论观点，体现了鲜明的本体化研究特征。

第二，从“中国模式”的讨论及界定出发，联系中国经济转型路径，发展出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探讨，构成经济思想理论本体化研究的第二个板块。“中国模式”的实践原型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成就，但一般认为，其思想要素源于外国学者。2004年5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拉莫（Joshua C. Ramo）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开始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论题。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界定比较简单，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这两个维度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治理，认为这种模式构成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一种发展道路。国内学术界则不单单是从经济层面，还从政治层面解读和界定“中国模式”，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央与地方的权利配置、政府干预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等维度讨论“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的讨论研究，引致对“中国经济学”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走自由市场经济道路，而是通过渐进式改革，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特别是经济规模跃居世界前列。一方面，国内学术界一些观点认为，这一经济现象与西方古典、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有某些契合之处，但许多方面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不能解释的。另一方面，21世纪前十年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理论和机制产生了怀疑，并促使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在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评价有不同意见。一派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该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的作用，并从这一核心观点出发对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宏观调控等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另一派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走“市场原教旨主义”道路，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结构性不平衡矛盾正是市场万能论所引致的弊端，照搬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只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误导。但无论是哪派观点，其立论的出发点基本是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为坐标系，探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模式和机制设

计。大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展开讨论，包括中国经济学的界定、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学术传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规范等。到 21 世纪 10 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更是成为了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据统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文，2016 年共 305 篇，2017 年共 379 篇。这一主题的研究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根本方法、理论属性、指导原则、历史定位、理论来源、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理论创新方向、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题组、李军林和张妮，2018）。对这些文献的观点进行归纳，一般的认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展现出的发展绩效、发展路径以及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范式已难以解释；要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及国情特色和制度条件，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体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紧密结合或以此为基点，其理论体系和内容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而不是另创一个经济学类型。2016 年 7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需要有效借鉴西方经济学，用经济学话语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作出描述和解释，进而总结提炼出一些规律性或定理性表述。这也是最能体现本土化功能的途径。

第三，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为条件，从调整供需结构失衡角度探讨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路径，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能过剩与经济去杠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展开研究，构成经济思想理论本体化研究的第三个板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与经济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一直存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需求增长趋缓，发达国家依靠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使中国

经济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进入21世纪10年代,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部署,也是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21世纪1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特征可以用“新常态”或“中国式新常态”概括,即指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结构失衡要求优化结构、优化发展质量;要素投入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要求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问题日益严重,要求实现绿色发展及包容性发展等。与经济新常态相联系的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由于经济新常态所要求的转型发展涉及深层次的结构失衡问题,因此在政策层面和理论层面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题。如果从宏观经济学原理考察,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市场均衡的两个变量,两者是不可分的。但就宏观调控手段或政策而论,需求管理被认为是偏重于总量和短期调控,供给管理则偏重于结构和中长期调控。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的理论来定义,其是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改革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习近平,2016:30)。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基于中国经济成长阶段和经济发展现状而提出的一种改革方针和政策规划,继而成为具有本土化色彩的经济学研究热点领域。据统计,2016年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文约5800篇,到2017年,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达7700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题组、李军林和张妮,2018)。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善供给质量、平衡供给和需求结构,因此引致出对低质量产能过剩、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低下、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治理思路和理论研究。这些经济现象都是有关联的,治理它们的一个核心环节是实体经济要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依靠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来提高盈利能力,吸纳集聚包括金融资产在内的经济资源,这既是中国经济由大而强的必经阶段,也是中国越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实现工业化、全面实现小康的必经阶段。

在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板块中,有学者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论题,从“要素禀赋结构”角度讨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并称这有别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林毅夫,2012,2017)。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归因于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水平取决于与（静态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最优产业结构。动态地看，要素禀赋结构会升级，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产业结构会循着新的比较优势而转型升级。这一思路在理论要素和分析方法上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一种宏观调控政策，其政策方向是循着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路，通过放松管制以提升效率、促进增长（Bhattacharya, 1997；Gersbach, 2004：9—22）。但“新结构经济学”试图将通常用于国际贸易分析的要素禀赋理论引入经济增长分析，并且在结构转型升级路径设计上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而有所标新，可以将其看作是经济学本体化研究的一种视角。

第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基础上，从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维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又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进行延展研究和“当代化”研究，构成了经济思想理论本体化研究的第四个板块。从历史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论题，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抽象化、空洞化，而是主张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国情特点相联系。理论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个发展过程。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特别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或概念范畴来诠释、论证、规范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实践以及相应的政策、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操作上是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演绎社会形态及经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进而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写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劳动价值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所有制理论。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一些纲领性政策和理论，如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效率优

先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平衡等，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又结合中国的改革发展实际对上述核心概念作了一定程度的致用性调适。以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适时性和致用性调适的归纳，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主体内容及主要成效。其他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论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创新与中国化、《资本论》的当代化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源头”与“中国模式”的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现实发展中的新情况并提出新理论等。从研究现状考察，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时空线索、科学框架、理论范式、主体内容等仍有不同的探讨视角和观点表述。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则是一个共同的基础，表现出鲜明的本体化研究特征。

（三）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辨析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可以表述为，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政策操作和经济学研究需要解决双重扭曲问题：一方面是市场机制的扭曲导致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是政府行为的扭曲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双重扭曲导致经济发展陷于结构性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主要不是源自周期性波动，而是源自体制性摩擦和耗散。为解决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学界展开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与总量分析相比较，结构分析需要放松更多假设条件，至少不再视制度变量为既定，观照的时间更长，涉及的领域更多，一般均衡分析的整体性更强。所以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表现出在本土化基点上寻找系统性、整体性构架的转型特征。

这一发展阶段经济思想转型的路径可以概括为两种代表性方案。一种方案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扭曲的主要成因是市场化进程迟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不健全和受到干预，扭曲的价格不能发出准确的资源稀缺信号，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结构性扭曲与市场化指数下降特别是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下降有直接关联。所以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该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操

作市场或直接用行政手段调结构。中国经济思想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构架应该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路径发展，核心要素包括公平的市场准入、自由竞争、价格灵活性、自主创新、透明的监管、消除要素市场出清的障碍、严格的产权保护、改革政府干预市场行为的制度和规制等。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所论证的市场最优环境作为基准点，将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以此来界定市场化改革方向和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方向。另一种方案则认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扭曲在相当程度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正是市场行为对效率的极端追求以及市场机制的盲目性、短期性、局部性弊端造成了经济秩序的失控和宏观失调。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和经济思想转型方向不能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私有化”；其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两极分化、追求共同富裕，公平和效率并重但更加注重公平与和谐；其核心特征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方案还有一个依据是，面对中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均不适用，它们不能解释更不能指导中国的改革发展。所以需要进行经济思想、经济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系统理论和整体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特色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实践和现实问题，三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以上概括的两种方案虽然观点和路径有差异，但其共同点则是力图在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基点上构建一种适用的经济理论或经济学，用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是经济理论中国化、本体化和中国实践理论化的整合过程，或者说是经济学本体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过程。21世纪10年代展开的有关中国经济学的讨论，既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发展，要求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更适用、更实证、更实用，也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本体化、系统性、整体性转型过程的学术景观。

从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层面考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两方面的状况。一方面，延续了前一阶段（1992—2011年）力求符合主流经济学技术规范的发展转型趋势。比如，在权威的经济学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大部分都是用实证的方法做的研究，即在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出新的假

设条件,对基本模式作适应性处理(引入新的变量),尽可能利用现有数据或利用中间变量替代方法以弥补数据不完整的缺陷,对所研究问题进行刻画并给出分析结论。如果理论模型和理论框架运用合理,再加上有一定质量的数据,就是一篇好的论文。另一方面,在一些比较大的论题的研究中,还是有较多的规范研究方法的运用,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学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讨论等。对于这些比较宽泛的研究领域,因其所涉及的层次和视角较多,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应该更合适。

结 语

改革开放准备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是整合了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调节相联系的研究框架,开启了将经济运行置于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主流理论构建。

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是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的需要而越来越关注现实经济问题,推动了经济思想开始由规范向实证的范式转型。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基础上,经济思想具有中西结合、力求符合主流经济学技术规范的发展特征。

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经济思想发展转型的标识是在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问题的“本体化”基点上寻找系统性、整体性构架。

综观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济思想发展流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社会实践要求经济思想理论更有解释力、更实证、更致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思想本体化、系统性、整体性转型的学术景观,反映了经济思想发展转型与社会实践、实证分析条件相结合的科学特性。

参考文献:

-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1986,《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展望》,经济日报出版社。
-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199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85—198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陈登科, 2020, 《优化资源配置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12月9日。
- 陈武元、杨俊辉, 1990, 《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完全相容——与私有化论者的商榷》, 《农业经济问题》第7期。
- 陈云, 1982, 《计划与市场问题》,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人民出版社。
- 程霖、张申、陈旭东, 2018, 《选择与创新: 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 《经济研究》第7期。
- 邓小平, 1988,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 经济管理出版社、改革出版社。
- 邓小平, 1993a,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
- 邓小平, 1993b,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
- 邓小平, 1994,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
- 顾准, 1957,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经济研究》第3期。
- 郭俊华, 2010,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 《经济纵横》第11期。
- 郭克莎, 2016,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经济研究》第9期。
- 郭学能、卢盛荣, 2018,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 《经济学家》第1期。
- 郭元晔, 1992,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第4期。
- 何诚颖、余鸿宁, 20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第二十二届年会综述》, 《经济学动态》第4期。
- 何瑛、杨琳, 2021,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历程、成效与展望》, 《管理世界》第7期。
- 胡钧, 200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和中国化》, 《经济学动态》第4期。
- 李斌, 1991,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商品经济结合理论讨论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李绍荣, 2000, 《西方经济学最优解概念新思考——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与一般均衡三大最优解透视》, 《经济学动态》第9期。
- 李义平、张文多, 1991, 《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结合理论研讨会综述》, 《经济学动态》第7期。
- 李政, 2012, 《“国企争议”与国有企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学习与探索》第11期。
- 林珏, 1996, 《“中国经济学发展研讨会”综述》, 《社会科学》第2期。

- 林毅夫, 2012, 《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苏剑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林毅夫, 2017,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经济评论》第3期。
- 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3, 《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经济研究》第9期。
- 刘真, 2021,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人民日报》8月5日。
- 斯大林, 1961,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 苏剑、陈阳, 2019,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及其应用》, 《经济学家》第6期。
- 孙治方, 1959, 《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 《经济研究》第9期。
- 王昉, 201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述评》, 《经济学动态》第7期。
- 王国成, 2012, 《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嬗变与超越》, 《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王亚南, 1959, 《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 《人民日报》5月15日。
- 吴易风, 2008, 《西方经济学家论马克思经济学——写于马克思诞辰190周年》, 《经济学动态》第1期。
- 习近平, 2016,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人民出版社。
- 晓喻, 199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研讨会综述》, 《经济学动态》第11期。
- 熊俊, 1991,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十大观点评述》, 《当代财经》第4期。
- 薛暮桥, 1953, 《价值法则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 《学习》第9期。
- 杨永华, 1989, 《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述评》, 《经济学动态》第4期。
- 叶航, 2003, 《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 《经济学家》第1期。
- 于祖尧, 1991, 《近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讨论述评》, 《经济学动态》第3期。
- 张朝尊、文力, 1992,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张天华、张少华, 2016, 《偏向性政策、资源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 《经济研究》第2期。
- 张雄, 202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赵峰、段雨晨, 2019, 《马克思的竞争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经济学家》第3期。
- 郑秉文, 2001,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课题组、李军林、张妮, 2018, 《2017年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热点分析》, 《经济学动态》第4期。
- 卓炯, 1981, 《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广东人民出版社。
- Bhattacharya, Rina. 1997. "Pace, Sequencing and Credibility of Structural Reforms." *World Development* 25 (7): 1045 - 1061.
- Gersbach, Hans. 2004. "Structural Reforms and the Macroeconomy: The Role of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 In *Structural Reform and Economic Policy*, edited by Robert M. Solow, pp. 9 – 22. Basingstok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n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Thoughts Development

Zhao Xiaole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experienced several development transitions more than 40 years ago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social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on economic thoughts, but also present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is bounded by systems and policie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preparatory stage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1978 – 1983); the stage of the reform of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ic system (1984 – 1991); the stage of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1992 – 2011); the stage of the reform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of the reform accelera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since 2012). Based on this clue, the article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each period.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Thought,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N00, N01, E11

(责任编辑: 倪诗妆)